

一、社会学研究方法新动态

1

陈苗、陈云松，2023，《计算扎根：定量研究的理论生产方法》，《社会学研究》第4期。

摘要：扎根理论的归纳逻辑和避免理论先入为主的原则与传统定量研究的演绎逻辑和假说检验大相径庭。在回顾传统定量研究理论生产局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一种以定量方式直接助产理论的“计算扎根”方法：借助机器学习和归因算法，按照因果是可预测性的充分不必要条件之原理，根据对因变量的预测力筛选出以往研究未曾关注的自变量，以提出新的理论假说。本文对计算扎根的基本思路、逻辑前提、方法基础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基于实际案例进行了演示。该方法弥补了定量研究理论生产的不足，在理论、学科、知识体系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2

刘河庆、梁玉成，2023，《透视算法黑箱：数字平台的算法规制与信息推送异质性》，《社会学研究》第2期。

摘要：本研究借鉴实验和逆向工程方法，通过设置若干虚拟账号与数字平台进行长时间真实互动，以尝试真正进入算法的政治化空间，分析算法规制对用户信息获取异质性的影响。实证结果揭示了数字时代算法规制的高度复杂化、精细化和隐蔽化。从信息主题维度看，算法增加了个

体获得多样化主题信息的机会。从信息语义维度看,算法强化了过滤气泡效应,出现信息推送的窄化和固化,不同个体被算法框定在语义向量空间中相对固定的位置,只被推送特定语义维度的信息。

关键词: 算法控制; 过滤气泡; 信息主题异质性; 信息语义异质性; 数字社会

3

臧雷振、徐榕,《方法论危机下的问卷调查:挑战、变革与改进路径》,《社会学评论》2023年第2期。

摘要: 高质量的问卷调查方法应用与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相辅相成。问卷调查作为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和政策评估的重要方法,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视野和议题的延展,以及竞争性方法的冲击,其生命力与竞争力遭遇一定程度的危机,进而带来方法弱化与替代、方法不信任与应用偏倚。作为方法规范性和有效性的前提保障,问卷调查的质量提升驱动着问卷方法的科学运用。本文围绕问卷设计和调查方案设计两个面向,对21世纪以来问卷调查中技术提升、方法交叉、工具运用等多元路径进行系统梳理与全面审视,并反思研究方法创新带来的“未预期后果”,进而阐释持续优化问卷调查方法的原则与可行方案,辨析新时代问卷调查方法何以持续贡献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和知识生产。

关键词: 问卷设计质量; 调查方案设计质量; 信度; 效度

二、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社会

1

赵一璋、王明玉, 数字社会学: 国际视野下的源起、发展与展望《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摘要: 为探索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对人类行为和社会运行的深远影响, 研究数字技术与社会环境相互建构的作用机制, 一个新的社会学分支——数字社会学应运而生并迅速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本文对数字社会学进行了简要介绍, 梳理了数字社会学在劳工经济与生产、数字政治与权力、社会关系与互动、身体与自我、社会不平等以及方法论革新六个方面的研究进展, 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中国与西方数字社会学的研究现状。中国在数字技术领域的飞速发展为社会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数字社会学在中国极具发展潜力。

关键词: 数字社会学; 数字社会; 数字技术; 数字治理

2

向静林、艾云, 《数字社会发展与中国政府治理新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第 11 期。

摘要: 数字时代的中国政府治理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超出了既有国家治理理论的解释边界, 对“行政发包制”“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等理论都构成挑战。通过建构数字社会发展与政府治理变革的分析框架, 并用其解读数字金融领域的政府治理现象, 可以发现,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实体空间之上创造了数字空间，产生“数实相融”的新型治理情境，给多层级政府治理带来三个关键性变化，即信息优势的上下分化、属地原则的效能衰减、社会风险的规模放大。这些变化成为驱动当代中国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因素，使得多层级政府出现“上下共治”的治理模式，它既不同于“行政发包”“上下分治”，也不同于“垂直管理”“高度关联”，是一种亟待深入研究的政府治理变革新趋势。

关键词：数字社会；政府治理；数实相融；上下共治

3

郭未、马炬申，2023，《“技术-关系-健康”视角下的互联网使用与青年世代健康》，《中国青年研究》第11期。

摘要：互联网技术赋能实现了社会关系的重组，“人媒互动”“人际互动”“偏好互动”的结构演化形成了个体间差异化的健康结果。围绕“技术-关系-健康”的逻辑主线探讨互联网使用对青年世代健康的影响契合了时代价值和学术关怀的基本内涵。基于2017年CGSS数据的系列计量因果推断方法的结果显示高频度互联网使用影响青年健康存在“双刃剑效应”：在具备提高个体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减少客观生病住院次数的“健康溢价”功能的同时，却导致青年群体BMI指数增长的“健康惩罚”。在路径机制方面，高频度互联网使用通过社会网络、健康管理和网络诱导等途径影响青年世代健康，其中健康管理与网络诱导在部分路径中也起到遮掩效应。

关键词：互联网使用；人口健康；健康惩罚；健康溢价；青年世代

三、婚姻与家庭研究

1

董浩, 2023, 《此情或可待: “离婚冷静期”规定对离婚登记数量趋势的影响》, 《社会学研究》第1期。

摘要: 本文关注“离婚冷静期”规定对离婚登记数量趋势的影响, 间接探讨了冲动等不可观测主观因素在我国离婚决策中的角色。基于民政部2018—2021年省一季度统计数据, 辅以国家统计局、裁判文书网、百度指数等数据, 本研究通过事件研究和双重差分等政策评估方法交叉验证发现, “冷静期”使得各省各季度离婚登记数量平均减少1.03-1.32万对, 较前三年降低了33%-42%。在以往复婚较普遍、青年离婚占比较大、对“冷静期”等离婚相关信息搜索较多的地区降幅更大, 揭示了部分潜在作用机制。

关键词: 离婚冷静期; 离婚趋势; 社会政策评估

2

张波, 2023, 《家庭代际关系类型及其对子代离婚风险的影响》, 《社会学评论》第6期。

摘要: 本研究基于家庭生态系统理论和代际团结理论, 运用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分析了家庭代际关系类型及其对子代离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以团结型关系模式为主, 主要有互惠型、奉养型、支持型和互动型四种; 不同类型代际关系家庭中,

子代离婚风险呈现出序列化特征：互惠型 > 支持型 > 奉养型 > 互动型。孝道观念对互惠型家庭中子代离婚风险具有强化效应，对奉养型与支持型家庭中子代离婚风险具有弱化效应；老一代与中生代互动型家庭子代婚姻稳定性最好，新生代奉养型家庭子代婚姻稳定性最好；男性支持型家庭、女性奉养型家庭子代离婚风险较高。

关键词：代际关系；离婚风险；代际团结；婚姻稳定性

3

於嘉、沈小杰、谢宇，2023，《中国育龄人群生育潜力影响因素的随机实验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摘要：文章利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搭载的联合分析随机实验数据，通过分析育龄人群对虚拟情境下他人生育潜力的评估探讨了生育规范的潜在差异和影响机制，并考察了其人群异质性。研究发现，个体对生育规范的认知具有可变性。经济资源对二孩与三孩生育潜力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生育在当代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消费品属性。照料资源的可及性有助于提升生育潜力，其中有长辈提供照料支持对二孩和三孩生育潜力的刺激效应分别约相当于家庭年收入增加12.5万元和6.29万元；低价的市场化托育服务对二孩生育潜力的提升作用均相当于家庭年收入增加13.86万元，但对三孩生育潜力而言，低价公立托育服务的提升效应明显高于低价私立托育服务，二者分别相当于家庭年收入增加8.87万元和6.61万元。性别偏好在生育潜力评估中的影响已不再显著，反映了传统生育规范的弱化。此外，研究表明，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和生

育意愿的育龄人群对经济资源、家庭照料与社会照料资源的偏好略有差异。文章认为，未来中国的生育行为可能因社会经济特征而呈现明显的分化，生育支持政策需要重点加强经济资源与社会照料资源的配套支持。

关键词：生育潜力；社会规范；经济资源；照料服务；性别偏好

四、消费与文化研究

1

朱迪，2023，《“宏观结构”的隐身与重塑：一个消费分析框架》，
《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摘要：在新发展阶段，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凸显，宏观的外部环境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也更为显著。不同学科都在探讨如何扩大消费并转向更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但传统研究往往囿于“社会经济地位”或“态度—行为”等范式，缺少对宏观外部环境影响的系统思考。“双重结构”框架强调，宏观外部环境对消费具有结构性约束：物质供给和文化习俗基于其社会共享性、通过多种机制影响消费行为。消费作为复杂结构约束下的产物，可以在供给—习俗—消费的动态系统中进行理解。理论和实证分析指向多元主体多重实践协同的行动框架，强调以改善消费的宏观外部环境来促进消费转型。重塑对消费的宏观结构分析，在拓展消费社会学经验研究视野、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都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宏观结构；供给；文化习俗；社会共享；可持续消费

2

胡安宁, 2023, 《识别文化的因果效应——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的前提》, 《探索与争鸣》第 11 期。

摘要:文化现实效应的既有分析重在勾画文化与其他待解释社会现象之间的相关性,以经验相关来指代因果。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的前提,是识别文化的因果效应。将文化的多层本体论建构置于“科尔曼之船”的结构个人主义分析框架之上,可以得出识别文化因果效应的关键四点:其一,如果宏观层次的文化是微观层次个体文化的集合性建构,那么识别集合文化因果效应的前提是控制其内部构成因素的个体文化。其二,如果集合文化可以直接作用于个体层面的外在行动或者偏好,那么识别个体文化的因果效应需要对集合文化进行控制。其三,无论是集合文化还是个体文化的因果效应,工具变量法都可以用来克服潜在的混淆偏误。其四,如果在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之间增加中观层次的制度因素,那么在特定的研究场景下,集合文化和个体文化的因果效应都难以准确识别。当下,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具体研究,需要在概念界定上进一步厘清文化和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理论论辩过程中审慎考察是否能够精确把握文化经验的现实效力。

关键词:文化;因果效应;科尔曼之船;混淆偏误;相撞偏误

3

陈伟、吴晓刚, 2023, 《宏观阶层结构与主观阶层认同——基于调查实验法的结果》, 《学术月刊》第 4 期。

摘要:已往关于主观阶层认同的文献多侧重于个人微观层面的分析,对

宏观阶层结构的作用讨论有限。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项目设计了一项调查实验，将三种典型的宏观阶层结构图片作为实验干预信息，随机发放给被访者，进而询问他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实验结果显示，相对于“梯子型”的社会阶层结构信息，“金字塔型”和“倒丁字型”这两种更不平等社会阶层结构信息会显著降低人们自我认定的主观社会阶层，而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信息则会增加人们的中间阶层认同。由此可发现，宏观阶层结构信息会影响人们对自身社会阶层的判定，对不平等的宏观阶层结构的认知将会降低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

关键词：宏观阶层结构；主观社会阶层；调查实验法